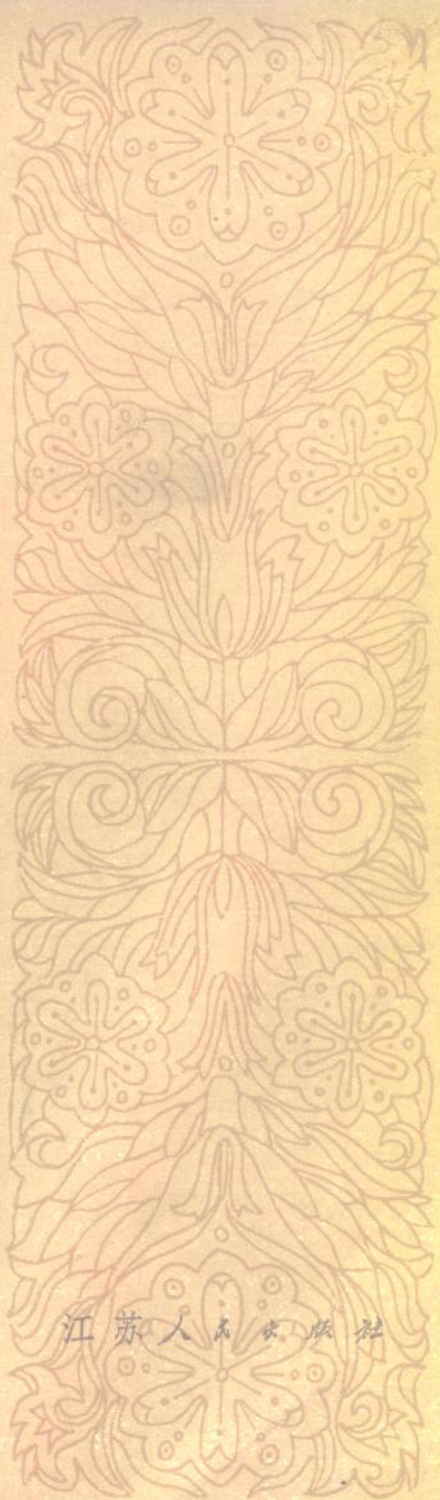


钟山文艺论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ZHONG
SHAN
WENYI
LUNJI

I206.7/16

钟山文艺论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3184



江苏人民出版社

703184

钟山文艺论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75,94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册

书号：10100·417 定价0.93

责任编辑 汤淑敏

前 言

本集共收论文二十篇，其中有古典文学名著评论和现当代重要作家、重要作品评论十六篇，理论研究和资料性论文四篇。这些文章大多数对所论述的问题有新的创见，观点明确，说理比较充分，文风也较清晰、流畅，对高等、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师、文学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这本集子里，我们选编了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目的是为了展开争论，从中探讨和研究文艺评论中的一些问题，以利于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

编 者

目 录

- 《水浒传》在历史上的积极影响不能抹煞
.....王俊年 裴效维 金宁芬 (1)
- 《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欧阳健 萧相恺 (16)
- 论探春.....严迪昌 (36)
——《红楼梦》人物论之一
- 试论《红楼梦》“真事隐去”的艺术特点.....谈凤梁 (59)
- 试论鲁迅小说的肖像描写.....刘静生 黄毓璜 (91)
- 朱自清散文的思想和艺术.....朱栋霖 (107)
- 试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华子风 (120)
- 写出历史的真实才能获得艺术的真实.....徐天健 (142)
——兼谈《大风歌》的继承和创新
- 形神兼备 栩栩如生.....朱 兵 端木国贞 (155)
——试谈刘宗敏艺术形象的塑造
- 霜重色愈浓 斗争见英雄.....胡德培 (171)
——《李自成》艺术谈
- 论赵树理的风格.....唐再兴 郑乃臧 (181)
- 植根于沃野的鲜花.....叶 胥 庄汉新 (201)
——谈《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人物形象塑造

- 论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艺术成就
.....周溶泉 徐应佩 (219)
- 试论《创业史》中梁生宝和徐改霞的爱情描写
.....陈 豪 刘长虹 (237)
- 中国工人斗争的悲壮史诗.....丁 帆 (255)
——重读《火种》
- 牧歌悠扬诗动人.....徐荣街 (270)
——重读闻捷的《天山牧歌》兼谈当前诗歌
创作中的一些问题
- 论结构艺术.....王臻中 (288)
- 论文学创作中的感情.....吴功正 (313)
- 报春紫燕 破晓曙星.....胡从经 (334)
——蒋光慈倡导革命文学功绩述评
- “诚望杰构于来哲也”.....邓啸林 (357)
——读《中国小说史略》

《水浒传》在历史上的 积极影响不能抹煞

王俊年 裴效维 金宁芬

《水浒传》问世以后的几百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很不一致。但是，在纷纭的说法中，大体上还是可以理出个头绪来的，那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它始终采取了两种相反的态度：前者既恨又怕，对它极尽诬蔑、禁毁之能事；后者则真诚喜爱它，其中有不少人还从中汲取反抗封建黑暗统治的力量。然而“四人帮”肆虐时期，上述这样一个历史的基本事实也同时被颠倒和搞乱了：《水浒传》被说成是一部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在历史上起过反动作用的坏书。现在，随着《水浒传》的再评价，曾经被歪曲了的《水浒传》在历史上的影响问题也有提出来作一次辨正的必要。

—

《水浒传》是一部内容上存在着较多矛盾的作品。但是，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它不失为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把它视若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对《水浒传》横加禁毁，妄图彻底将它消灭。如明崇祯十五年以及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同治等朝，都曾明令严禁《水浒传》，不仅对此书

“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而且连民间说《水浒传》书、演“水游戏”也“严拿治罪”^①，甚至“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作为“辨守令之优绌”^②的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又摇笔鼓舌，肆意对《水浒传》进行诋毁，妄想抵制它的巨大影响。反动文人诬蔑它为“害人心，坏风俗”、“海盗”之“最可恨者”^③，诅咒它的作者“子孙三代皆哑”，并说这是“天道好还之报”^④。其中最恶毒的是金圣叹和俞万春。金圣叹深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因而伪托得到“古本”，腰斩《水浒》，逐条批点，大肆歪曲，百般攻击，妄图把《水浒传》“一旦尽废”。俞万春则看到《水浒传》越被禁毁“越发传播得快”，悲叹“在下亦不能禁止他”，于是诡称“雷霆上将”之奇梦，拾取金圣叹的唾余，用二十二年的时间写了一部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斩尽杀绝的反动小说《荡寇志》，妄想取《水浒传》而代之。

反动派对《水浒传》的切齿痛恨，以及他们扼杀《水浒传》的不遗余力，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为了替他们的主子寻找诬蔑《水浒传》的历史根据，却不惜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硬说“《水浒》是为地主阶级而创作的”，“《水浒》为地主阶级赞赏和广泛流传”^⑤。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他们的论证方法是：首先认定《水浒传》是“坏种”——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坏书，然后再从历史上找出宋、元、明三代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队伍实行“招安”政策的事例，于是就得出结论说：《水浒传》正是当时的“反动文人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创作出来的”。他们又进一步用皇帝、大官看过《水浒传》和封建社会中说过《水浒传》好话的都是地主阶级文人的例子，推断出《水浒》是“为地主阶级赞赏”和“传播”的结论。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

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⑩上述的论证方法，正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典型表现。列宁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⑪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从来就是采取“剿”、“抚”并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我们说《荡寇志》是一部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鼓吹屠杀政策，为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反动小说，决不仅仅因为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血腥的镇压政策，而是根据它的作者亲自参加过镇压瑶民起义的事实，根据他写的《〈荡寇志〉缘起》和《〈荡寇志〉引言》，特别是根据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实际内容。《水浒传》的主要倾向既不是宣扬投降主义，更没有别的任何比较有力的材料能够说明它是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招抚”政策的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因而那种从史籍堆里挑出一些与《水浒传》毫不相干的统治阶级实行“招安”政策的事例，来证明它是一部“适应地主阶级政治需要而创作的”坏书的论断，是“连儿戏也不如”的！

对于皇帝、大官看《水浒传》，也要作具体分析。世界上事情是复杂的，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目的去看同一部作品。如果因为某皇帝或某大官看过某部书就断定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赞赏和提倡，从而加以否定，那末可以肯定的古代作品恐怕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古代作品中很少有不被他们

看过的。至于根据肯定、赞扬《水浒传》的都是封建文人的事实来否定《水浒传》，那是更加荒谬可笑了。因为稍有知识和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有进步、反动、落后等等的区别；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但是他们被剥夺了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不识字，当然也就谈不上作书写文章，因此封建社会里产生的所有作品，几乎无不都是知识分子的著作（即使民间口头文学，也要经过知识分子记录，才能流传下来），难道都应该否定吗？这些，本来都是不成问题的起码的常识，这些人却自以为发现了什么新的奥秘，从这里大作起吓人的文章来。

他们的文章中似乎也讲出了一些“道理”。概括起来，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水浒传》“是一部封建地主阶级的‘官书’”^⑧。他们首先抬出鲁迅先生，说这话是鲁迅说的。然而，查一下鲁迅的原文却是这样：“然《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⑨论者故意削去了“世人视若”四字，便把鲁迅的意思完全歪曲了，变成了鲁迅认为《水浒》是“官书”。这是一种很不正当的手法。其次，他们又在“都察院刻本”上作文章。他们说：既然《水浒传》有“都察院刻本”，而都察院是当时封建国家的最高监察机关，可见它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喜爱和欣赏的“官书”无疑了^⑩。这种简单的逻辑推论，用在妇姑斗嘴或可以，用在严肃的科学研究中是丝毫也不能说明问题的。试问：“四人帮”在内部印行了大量革命老干部的“黑材料”，难道说是他们喜爱这些老干部吗？！我们国家的出版机关内部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等等反面教材，难道能说我们欣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吗？！根据明代周弘祖撰的《古今书刻》记载，明代的都察院不仅刻印过《水浒传》，而且刻印过《史记》、《文选》、《杜诗集》、

《三国志演义》等等，按照他们的上述逻辑，这些不是都成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欣赏的坏书了吗？！如果是这样，“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哪里还有什么“灿烂的古代文化”呢！都察院，明代前叫御史台，掌图籍秘书，司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违绳愆、推盗捕贼等事。这样的机关，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目的刻印一些不同的书籍，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把他们所刻印的图书一律视为封建统治阶级喜爱和欣赏的官书，这道理是并不深奥的。

其二曰：“封建统治者对于《水浒》是名贬实褒”，明禁暗行^②。论者最重要也是最“有力”的一条论据是：乾隆皇帝一面颁布“禁毁”《水浒》的命令，一面“却叫人把全套《水浒》改编成戏剧在宫廷大演特演”；既然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老子”如此看重《水浒传》，那么它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文学”岂非铁案一桩了吗？“四人帮”是惯于搞阴谋的。这种“帮风”表现到他们的文章里，特点之一就是使用种种卑鄙手段，对经典作家的著作和一般历史资料随意进行歪曲、篡改，从而塞进自己的私货；为了怕被别人查出，所以引文一般都不注明出处，我们的有些同志竟也沾染了这种习气或者受了影响。查上面他们所用的这条材料，载于清代昭槁《啸亭续录》卷一。有关原文是这样的：

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后又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

昭槁的记载说得很清楚，所谓“在内宫大演特演”的《忠义璇图》，原是“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并非“把全套《水浒》改编”而成。再读《忠义璇

图》，事情就更加清楚了。首先，《忠义璇图》并不是如谷进等人所说的“十本二百二十四场”，而是十本二百四十出。由此，不能不令人怀疑：论者究竟是否看过此书？其次，它虽然很多情节取材于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但增加了辽金交兵、金灭北宋、徽钦北狩、宋臣尽忠死节、金朝解甲赏功等许多内容，而且在叙述这些故事时，表现了鲜明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正统观念，寓有强烈的宣扬封建道德的企图，并极力掩饰民族矛盾，美化和歌颂金朝侵略者（以献媚、谄谀于清朝），严重地歪曲了历史的真实面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谱梁山诸盗”完全袭用了金圣叹的反动观点（连所用的许多语言也相同），大施其偷天换日的手段，把《水浒》故事肆意歪曲、篡改，实际上是一部可以和后来的《荡寇志》并列为姊妹篇的“反《水浒传》”。作者在第一本第五出中通过“开场人”之口说明了他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态度和创作意图。因为事关至要，不得不花较多的篇幅抄录于下：

开场人白：……怎么又叫做《忠义璇图》？这等说来，宋江等竟是个忠臣义士么？……夫忠者，事上之盛节；义者，处己之大经。人能识此两字，守之终身，则达而在朝，经文纬武，为国家宣力之良臣；即穷而在野，市井草莽，也不失安分守己的百姓。今宋江等一百八人，秉豺狼虎豹之姿，行夺攘矫虔之事，偕黥刑迁徙之辈，矜揭竿斩木之雄，反诡称天罡地煞等名，以为惑世诬民之具。岂有星精下降，相率为盗之理？此实为圣世所必诛，清时所不赦。……当今圣天子……令我们就歌咏太平之文，寓维持风化之意。……真忠真孝，任他生土生天；假义假仁，难骗愚夫愚妇。是人知尊君亲上，畏法怀刑；到处尽讲让型仁，风行俗美。长享升平之福，永登仁寿之乡。

整部戏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编写的。它抹煞了封建

社会的根本矛盾，把原来《水浒传》中揭示的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因此引起农民反抗的阶级斗争，诬蔑为“巨寇作乱”和仅仅是个人之间恩怨的报复，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抹煞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它全部删除了原来《水浒传》中梁山起义军“劫富济贫”、“秋毫无犯”等等的描写，把各个山寨的农民起义军一概污蔑、丑化成“杀人放火”、奸淫劫掠、“烧臀打吊”、“逞凶行暴”的强盗。它又砍削了原来《水浒传》中对皇帝不满乃至有损皇帝尊严的一切字句，对地主阶级和最高统治者极力歌颂和美化。剧本最后整整用了十七出的巨大篇幅，写宋江等死后被惩和张叔夜等尽忠死节及其死后被旌的故事，把“假忠假义”的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与“真忠真义”的张叔夜等反复对比。作品写东岳大帝同十殿阎君奉玉帝之命“惩祸乱”、“勘奸雄”、“定忠义”、“明善恶”，分别把梁山一百零八人审判定罪：宋江、吴用“假托忠义，惑世诬民，招纳亡命，擅杀官军，……”；关胜、花荣等“弃官从贼，玩视王法”；晁盖、刘唐等“打劫生辰纲”，“实为梁山构祸之始”，“法无可贷”；鲁智深、武松等“啸聚山林，负隅抗命”；张顺、李俊等“蟠据水洼，截江行劫”；卢俊义、李逵、林冲等“扶同入伙，伤害生灵”；通通打入尖刀山、碓磨、血湖、毒蛇坑等重重地狱，让他们不断受苦。最后，宋江、吴用入水泥犁，永不超生；其余一百零六人，都贬入畜生道。与此同时，又写张叔夜等被旌为“善门忠义之臣”，先为“升入天堂”，“上游天宫”，然后“转生人世，遭逢盛世，富贵寿考，金紫奕世”。对张叔夜等是这样竭力地美化和歌颂，对宋江等是如此疯狂地攻击和诅咒，这充分证明了《忠义璇图》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反对农民起义的戏剧，它同《水浒传》是完全相反的作品。乾隆内廷“大演特演”《忠义璇图》，不但不能证明封建统治阶级爱《水浒》，恰恰相反，倒

证明了他们恨《水浒》，怕《水浒》；因此，想以此来证明《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坏书”不仅徒劳无功，而且适得其反！

其三曰：“‘禁毁’《水浒》，只是‘主剿’派申张‘征剿’‘政策’，打击‘主抚’派的一种手段”^⑤。这更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因为，第一，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主抚派当权反对主剿派时就势必要开禁，提倡读《水浒传》，可是历史上从来找不到这样的事实。第二，历次“严禁”《水浒传》的原因，都是说它“贻害人心”、“教诱犯法”、“蛊惑愚民”，“犯上作乱”等等，而从来没有半字提到是为了反对主抚派的“招抚”措施。第三，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从来是采取剿抚并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剿不了就抚，抚不了就剿，明末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时期的崇祯朝表现得最为明显。崇祯皇帝本身就是个一会儿主抚，一会儿主剿，出尔反尔的人物。所谓崇祯后期熊文灿、陈奇瑜、杨鹤等几个主抚派的大臣接连地被杀头、流放，也不过是在强大的农民革命的暴风雨中，崇祯皇帝想借此振一振“兵威”，以挽回颓势的牺牲品而已，其实他们又何尝是一味的主抚派！崇祯十二年十月，熊文灿“论死弃西市”，可是代替他“督师讨贼”的杨嗣昌仍然是剿抚兼用，直到崇祯十三年十二月还被他“招抚”了满天星、张妙子、邢家末以及李自成的部将大天王、镇天王、一条龙、小红狼、九梁星等许多支起义军。十四年以后，李自成起义军攻下洛阳，杀死福王，大败傅宗龙、汪乔年、丁启睿诸军，占领河南全省，接着攻湖广，下襄阳，破潼关，进西安，……义军成席卷之势，明王朝已岌岌可危，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主剿”、“主抚”的问题！崇祯十五年六月发出“严禁”《水浒传》的诏令，从全国形势看，那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无限恐慌的一种表现；就具体问题言，那

是接受了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等作为“息盗安民”措施之一的“焚贼书”的建议(详见后)。所谓明末禁毁《水浒》是主剿派反对主抚派之说，完全是向壁虚构的产物！清代康熙、雍正朝和乾隆十九年都曾禁毁《水浒传》，但那时清统治者主要是向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用兵，内地虽然还存在以秘密结社形式出现的反抗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但规模很小，而且只限于个别地区，就全国来说，正处于清朝的“盛世”时期；同治七年四月，充当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又札饬严禁《水浒》等小说，但这时正是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几年以后的所谓“中兴”时期：都根本不存在什么“主剿”、“主抚”的斗争问题。论者谓“到道光咸丰年间，《水浒》又被‘禁止’，然而究其社会原因，则又与明末禁《水浒》情况相似，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力主‘用兵荡扫’农民起义，排斥‘招抚’措施的一种表现。”^⑩这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道光朝有关禁毁小说、戏曲的十八次上谕、诏令中，无一具体提到《水浒传》；咸丰元年七月虽然明确禁毁《水浒传》，但那时太平天国起义才仅仅半年，还只局限于广西永安地区，朝廷内不存在“主剿”、“主抚”的争论，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主剿派“排斥”主抚派而去禁毁《水浒传》的问题。总之，所谓禁毁《水浒传》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主剿派反对主抚派的斗争云云，实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欺人之谈。

二

与反动派仇恨《水浒传》相反，人民群众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却十分喜爱和欢迎它。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一曰：“今世传街谈巷语，……《水浒传》特为盛行。”^⑪又曰：“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⑫因

此，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不断禁毁，《水浒传》还是“家置一编，人怀一篋”^①，“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②，真是到处流传，雅俗共赏。“数百年稗官俳场，都为压倒”^③，“闾阎市俗，乡曲愚氓，目不知书，先入为主，所见所闻，只有此数。每于酒阑灯熄之候，豆棚瓜架之旁，津津乐道，据为典要，且以一知半解，夸耀同侪。”^④说《水浒》故事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是一点也不夸大的。

更加重要的是，《水浒传》对后世的人民反抗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明末以来的许多次农民起义，都从中获得了力量，汲取了各种斗争经验和斗争方法。俞彞《荡寇志·续序》中说：“嘉庆中叶，黎民滋事，……以《水浒》传奇煽惑于众，适有苛索之事，遂成斯变。”^⑤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说：“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伐不息，草野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非由于拜盟结党之徒，托诸《水浒》一百零八人以酿成之耶。”^⑥这些反动文人把农民起义完全归结为受了《水浒传》的影响，固然是唯心史观在作怪（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他们的记载，也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从《水浒传》里得到革命启发，受到革命鼓舞这一历史事实。清刘銓《五石瓠》说：“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⑦张德坚《贼情汇纂》说，太平军的策略，“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⑧清末署名醒醉生所撰《庄谐选录》中转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大汉奸刽子手胡林翼的话说，草泽英雄的“奇谋秘策”，“全以《水浒传》为师资”^⑨。至于明、清农民起义领袖以梁山英雄好汉的名字、绰号取名，或用梁山起义军的口号、旗帜以资号召，这些更是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一切

都雄辩地说明了《水浒传》对于后世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所产生的巨大深刻的积极影响。而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苏州以后，就把俞万春写的与《水浒传》对抗的反动作品《荡寇志》的版片付之一炬，这更突出地说明了两个阶级在对待《水浒》问题上禁毁与反禁毁、抵制与反抵制斗争的激烈。

无数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了《水浒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过积极的、革命的影响。可是，有些人为了要证明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坏书，偏要说它起了反动作用。他们的“理由”是：“明代中叶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水浒传》的“反动影响下”，就出现了“仿效《水浒》的队伍”，“叛变投降”的“首领”^⑧。这“理由”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对农民起义队伍的或剿或抚是封建统治阶级从它的阶级利益出发的根本政策。在统治阶级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一小撮农民起义军中的败类搞投降活动是并不奇怪的。把这一小撮革命人民的败类向统治者投降归结为《水浒传》的影响或作用，完全是“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种表现。其次，如果说明代中叶以后农民起义队伍中出现的投降派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那么，在《水浒传》产生以前农民起义队伍中出现的投降分子又作如何解释呢？

他们的一条具体“论据”是：“梁山地区曾有一支几万人的起义军，……但这支队伍的首领李青山等却醉心于《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日日讲招安’。结果受招安后却被送到京师当作‘献俘’而杀掉。”照他们说来，李青山简直是个宋江第二。但一查材料，事实却并非如此。据《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五载：“崇祯十五年正月丙子，山东盗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饥啸聚数万人，屡寇兖州。给事范淑泰、鲁府左相俞起蛟拒之，俘青山。”^⑨《明季稗史初编》卷七《烈皇小识》的记载与上同，谓“给事中范淑泰、鲁府长史俞起蛟击败